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八〇期 ——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301d)

---

【史海钩沉】	康生与“谋杀苏枚”案	凌 云
【文革一页】	“文革”时期“三突出”文艺创作理论的出笼及危害	彭厚文
【往事非烟】	“九一三事件”中的空军夜航师	一直在飞
【史海钩沉】	1975年邓小平曾组织“写作班子”抗衡江青	丁 东
【各抒己见】	我们该如何反思文革？	孙立平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 【史海钩沉】

### 康生与“谋杀苏枚”案

• 凌 云 •

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已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认定，只是因为已经死亡，依照我国法律，决定对他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整人，是康生的看家本领，直接、间接挨过他整，遭他阴谋诬陷，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托派而被捕坐牢，甚至丧失生命的，难以计数，他亦以此出了名。人们谈到康生时，都想刨根究底弄个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坏？为什么这样狠毒？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延安时期，我曾在康生任部长的中央社会部工作了5年，接着又随他领导的中央土改工作团一起到山东，其间约有大半年的时间担任他的秘书。从1950年起到“文化大革命”，又长期遭康生和他老婆曹轶欧的诬陷与迫害。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有些同志希望我谈谈康生的情况。其实我也不清楚康生的底细，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也回答不了。前些年我有机会比较系统地了解康生制造的“谋杀苏枚”案的翔实情况，由此联想起我亲身经历或间接听闻的一些往事，回忆和思索，使我有话想说，不吐不快。

我以为，从1948年以后我所接触的事实看，康生整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左”，搞什么“逼供信”；也不能简单地解释成为了抓权，排斥异己，结党营私。我认为康生的整人与他和曹轶欧这家“夫妻店”的利害紧密关联。在他们俩看来，周围的人都不可信，总有人想整他们，不是“坏人”，就是“特务”；而他们自己总像是在紧张地保护着什么隐私，生怕被人发现或抓住他们见不得人的什么秘密。而康生与曹轶欧制造的这起“谋杀苏枚”案，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佐证。

#### ◇ 苏枚自杀，偏说他杀

苏枚，原名曹文敏，是曹轶欧的亲妹妹。1928年由康生介绍入党。历史上曾被捕，出狱后，康生给她恢复了党籍。1950年春夏间，康生与曹轶欧在杭州疗养，苏枚同他们住在一起，有一天忽然跳了楼。康生硬说是保卫人员把她推下楼的，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康生还把“残害苏枚”作为当时担任他秘书的沙韬的一条罪状。苏枚跳楼无恙，回到北京，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到中央政法干校任政治部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正当造反派组织到处“揪叛徒”的时候，苏枚竟服下大量安眠药自杀了。时间是1967年4月6日。上午10时许，她的儿子回家，见房门紧锁，呼叫没有人应答，便从厨房破窗而入，发现苏枚睡在床上，已深度昏迷，无法叫醒，当即报告校方，叫救护车送往北京医院。经抢救无效，苏枚于当日下午3时47分死于医院急救室。

为了查明苏枚死因，北京医院进行了尸体解剖和药物检验，于4月18日对苏枚之死作出结论。结论报告说：“根据患者处于昏迷状态，各种反应均消失，血压下降，唇印紫绀及心电图检查有心肌缺氧等临床现象，死亡后病理解剖在胃内发现有多量药物存留，经过验定该药物为导眠能。小便检验导眠能为阳性。因此患者之死亡原因为安眠药（导眠能）中毒”。另经解放军总后勤部、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等单位多次化验、鉴定，结论是一致的：苏枚是服安眠药自杀身死。接着，公安部又组织公安部治安局、政法干校和北京市公安局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尸体检验和现场勘查，未发现外人作案的任何痕迹，排除他杀的可能，认定苏枚确属自杀无疑。

但是，康生与曹轶欧坚决不接受苏枚自杀身亡这个确凿无疑的事实。他俩不等医院的结论，也不等公安部门现场勘查的结果，当天晚上就迫不及待地在北京医院向政法干校造反派的人讲述起苏枚的生平，说她在白区工作如何英勇，如何有贡献，“是个好同志，不会自杀”。责令公安部成立“苏枚被害案件调查组”，并要立即为苏枚开追悼会。康生说：“你们不开追悼会，我们开家庭追悼会。”开追悼会时，康生、曹轶欧特意带一个警卫班，威风凛凛，到场示威。

追悼会前，康生、曹轶欧多次接见政法干校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还连续召见联合调查组听取汇报。在1967年5月12日的第五次汇报会上，康生讲了很长一番话，他说：“苏枚既然站在革命方面，保守势力打击她是必然的。”“她虽然受到打击，不等于动摇革命信心”，强调：“要从一个具体问题看出阶级斗争”。康生最害怕的是医院检查和现场勘查作出的科学结论。他摆出理论权威的样子，假惺惺地说：“要通过这个案件学会用辩证的方法，不是主观片面，而是实事求是，全面、客观、辩证地看问题，做调查工作。”接着，话锋一转，说：“调查中涉及很多技术，凡是接触到技术，就很容易形而上学，如法医、化验、侦查，越是技术专家，越容易形而上学、片面。”他对医院和公安部门作出的科学结论，全都不予承认。

曹轶欧配合康生，随心所欲，信口制造“谋杀”的论据，提出了一大堆“谋杀”的疑点。比如说：苏枚尸体的药斑是“外伤”；厨房窗子的小破洞是“人为的”；铝壶底有两个凸起，是“凶手”为吓唬苏枚敲打水壶形成的；奶锅里残渣发臭，有点水底，是“有人冲刷毁灭罪证”。最恶毒无耻的是说“苏枚胃里的安眠药是医生解剖时放进去的”等等。这些为了掩盖真相而制

造出来的奇谈怪论，当然经不起核证，被调查组一一否定了。

曹轶欧还乱指乱咬“谋杀”嫌疑人。她说，政法干校副校长石磊住在苏枚楼下，苏枚死的当天，她在苏家就见到石家的人两次上楼归还借用的小磨，看水管漏水，这是打听动静。又说，干校卫生科科长闻伯俊在北京医院抢救苏枚时“出来进去，一定是在策划什么”。公务员段学思“不能因为是贫农就排除他，他同石磊住在一起，要联系起来看”。先后被指名为“谋杀案”嫌疑人的共8位，强令调查组进行重点调查。

这个调查组还是实事求是的，根据事实依然确认苏枚是自杀。对此，康生、曹轶欧极为不满，一再指责“不突出政治”，“单纯技术观点”。调查组把苏枚自杀的证据材料汇总写成书面报告，送给当时公安部的负责人李震。李震不得不承认苏枚是自杀，但也要了个花招，要调查组“一次不要报这么多材料，一件一件地慢慢报，时间长了，不了了之”。

#### ◇ 直接操纵，滥捕无辜

真能不了了之吗？1967年底风波再起。李震接到政法干校某人的诬告，说王久成（政法干校主任教员）私下到辽阳东北民警干校调查苏枚历史上的被捕问题。曹轶欧得知后，神情激动，全身颤抖。第二天，康生与曹轶欧经由谢富治和李震下令捕人。被捕的有石磊、闻伯俊，罪名是“谋害苏枚”。还以“进行黑调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逮捕了王久成。逮捕行动开始前，调查组一再向李震申辩：怀疑石磊与闻伯俊杀人没有根据，王久成到辽阳搞“黑调查”没有查对核实。这时，李震却一改原来不了了之的态度，不顾调查组的申辩，强令执行，决定另行成立“干校军管组”和“石磊专案组”，对所谓嫌疑人严刑逼供。

康生、曹轶欧利用中央政法干校归属公安部领导的特殊条件，借口“防止案情扩散”，把“石磊专案”交给当时由公安部负责的“中央专案三办”代管，并指令政法干校军管组组长兼任“石磊专案组”组长，实际上是直接对康生、曹轶欧负责。康生、曹轶欧把此案定性为“反革命谋杀”，多次在家中召见专案组负责人，当面作指示，逼令抓“凶手”。案件进行情况，“作战方案”，以及专案人员的变动，受审人员到医院看病，都要向他们汇报，经他们批准。用“专案组”负责人的话说，“是在康老关怀下，由曹大姐直接抓的”。后来有人讥讽说，这是康生、曹轶欧的“家庭专案组”。“专案组”成立后，捕人越来越多。石磊的妻子是西城区月坛街道办事处干部，专案组竟以“群众专政”的名义，将其抓到政法干校院内，单独关押了6年。闻伯俊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也被不分青红皂白逮捕入狱。1968年4月以后，又将政法干校另一副校长张效良、卫生科医生宋公田、公务员段学思等逮捕入狱。北京医院的内科女医生顾惜春，1967年4月6日碰巧在急诊室值班，参加了对苏枚的抢救工作。根据苏枚的症状和解剖化验的结果，她从医生的职业道德出发，认定苏枚是自杀身死，为此触怒了康生、曹轶欧。1969年11月11日，以有“严重问题”为名，被捕入狱。

1968年1月，政法干校实行军管。在“专案组”迫害无辜的同时，按康生、曹轶欧的指示，政法干校的“文化大革命”围绕“谋杀苏枚”案进行，开展“大揭发”，“查凶手”，“追后台”，大抓“石磊一小撮”。曹轶欧再三强调，“苏枚被害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问题”，凡是对苏枚提过意见或对“谋害”表示过怀疑的，都被诬为“反康生”，“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遭到批斗和挨整。这起“谋杀”冤案，遭诬陷迫害的多达99人。其中捕押在监狱的9人，隔离关在政法干校内的23人，逼死2人，逼疯3人，整成终身残废的1人。

曹轶欧对“专案组”刑讯逼供、以假作真的卑鄙行径极为赞赏，又写信，又送“语录”，一再表扬是“高举”、“活学活用”。在康生、曹轶欧的鼓励下，刑讯逼供愈演愈烈。他们要攻破石磊这个“堡垒”，但直到最后还是连一根稻草也没有捞着。石磊是这一冤案的“首要分子”，被

关押了7年，受尽了种种酷刑的迫害，身心遭到极大摧残，九死一生，始终顶住了逼供，挺住了腰杆。

1969年11月17日，按照康生、曹轶欧的旨意，公安部领导小组谢富治、李震等制造了一份报送中央的假报告，以逼供出来的假口供为依据，加上拼凑捏造，硬把苏枚自杀说成是“谋杀”，诬说是石磊、闻伯俊、宋公田“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地谋害的”。谢富治等同康生、曹轶欧一样，最害怕他们所谓的“黑调查”，也就是害怕揭开苏枚历史上的谜团。说“黑调查”是对苏枚“进一步进行政治陷害，恶毒地攻击康老”，“其用心险恶，无以伦比！”总之，苏枚的历史是触动不得的。在报告中还说：“他们的黑后台还有待于深挖”。看来是想把他们要整治的更大的人物罗织进来，这才是真正的用心险恶！

但是，冤案毕竟是冤案，假口供不能当真。从1971年起案件实际上搞不下去了。康生、曹轶欧咬住“谋杀”不松口；对石磊等人则关而不放，折磨得浑身是病。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在押的人才陆续放出来。石磊是1975年3月2日放回政法干校的，但直到康生死后的1977年，“专案组”还在阻挠对此案作出平反结论。这年6月9日，“专案组”在写给公安部负责人的信中说，苏枚是怎么死的，“这个结论不好作，也不能作”。“特别是结案过程中，康老曾指示，不要再为此案打扰曹大姐了。”“要给苏枚之死做结论，必须通过她，这对她身心健康是有害的”，云云。后来由于胡耀邦同志的果断决定，公安部党组于1978年5月作出《关于因苏枚自杀造成冤错案件问题的复查报告》。石磊等同志的冤案才于1978年10月相继得到平反。

#### ◇ 冤案虽平，谜底未揭

这桩冤案的受害者是平反了，可是苏枚为什么要自杀，又恰恰在“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组织“揪叛徒”的时候决心一死呢？这个最重要的疑问并没有得到解答。康生、曹轶欧又为什么这样性急，慌忙跳出来亲自导演了这一出恶作剧，并颠倒黑白，用尽一切卑鄙手段，蓄意制造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冤案？

原在济南市公安局工作已经退休的几位老同志向我提供了有关苏枚的一段历史情况，使我想得很多，不妨写下来供大家思考。

苏枚（曹文敏）1928年由康生介绍入党。1930年她和丈夫刘少甫被派到济南，刘任中共地下党山东省委书记兼团省委书记，苏在省委机关工作。他们的家在济南市内顺街一个居民院内，是省委秘书处的机关。这时曹轶欧的前夫李应臣（曾是上海地下党沪西区委书记，已叛变）也从上海来到济南。一次，李应臣正巧看到出门倒水的苏枚，当即密报给国民党特务机关，经过盯梢监视和密查，并派特务仲文焕带家属住到苏枚家隔壁严密监视，不久逮捕了苏枚与刘少甫。接着，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济南以至山东省内到处进行搜捕，中共山东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相继被捕的有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刘谦初和党的一大代表邓恩铭、女革命家郭隆真等20多位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人。这些党的重要人物，后来都被敌人残酷杀害，唯独苏枚一人出狱生还。苏枚出狱后不久，由康生恢复了她的党籍，分配了工作。

苏枚的这段历史，现在是没有人再去彻底查究了。但是，康生和曹轶欧把苏枚自杀硬栽成“谋杀”，用尽心机，制造冤案，残害无辜，究意为的是什么，是为死者苏枚，还是为他们自己？

康生心怀鬼胎已久。让我们听听曹轶欧和康生自己是怎么说的。1967年6月29日，即苏枚自杀身亡后2个月又20多天，曹轶欧在笔记中写道：“许多问题前前后后联系起来看，枚被害不是孤立的”，“枚被害也不仅限于干校一个单位，有远因、近因”。“远因：饶（漱石）、

李（？）、杨（尚昆）、李（克农）”，“近因：（苏枚）分配到干校去是安子文、帅孟奇早已计划好的……”安和帅，一个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个是副部长。1968年7月，康生亲笔将两人列入“叛徒、特务”名单，进行诬陷迫害。

1967年7月15日，即苏枚自杀身亡后3个月零9天，康生与李震等人谈话，造谣刘少奇迫害他。又说：“苏枚同志的事，同罗（瑞卿）、杨尚昆、李克农有关。（公安部）五〇年档案中，有没有罗（瑞卿）、李克农陷害我的文件，找可靠同志翻一翻。”

康生与曹铁欧夫妻两人唱的是一个调，意思是说“谋害”苏枚为的是“谋害”康生，并且把“有待于深挖的黑后台”都一一指明了。

#### ◇ 历史谜团有待历史解开

康生、曹铁欧把刘少奇、罗瑞卿、杨尚昆、李克农等都牵进去，是有一段历史背景的。

1947年冬，康生率领土改工作团到达山东渤海区。先是参加该区的土改整党会议，第二年春，工作团和区党委的同志组合一起到阳信县搞土改。负责人是区党委的秘书长彭瑞林，曹铁欧和贾琰（高文华的夫人）与彭的夫人分在一个村工作。因为工作中有些不同意见，曹铁欧竟借口彭的夫人历史上参加过“三青团”，诬陷她是“国民党分子”，“有政治问题”，“包庇村里的坏人”，还无理指责贾琰一道反对她，“包庇坏人”，是“立场问题”，在村里大闹一场后，称病回到区党委住地。曹铁欧大闹工作组的时候，康生和我正在西柏坡中央工委（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回到渤海，曹铁欧就向康生“告状”。康生、曹铁欧要我转告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张晔查究彭的夫人的“政治问题”。我不能鲁莽行事，先向中央工作团的几位同志了解情况，他们都不满曹铁欧的所为。张琴秋大姐说曹“太过分了”。徐冰说“曹铁欧政治上太狭隘”，要我不必管曹这桩子事。我觉得曹铁欧确实没理，也就没有再理会她。高文华曾经担任过白区地下党北方局和省委的领导工作，是一位很有修养的老同志。四五月间，在他与贾琰要回中央前，特意向康生道歉，说贾琰对不起曹铁欧。康生没有作什么回应。至于我的不遵命，康生与曹铁欧当然很不满意，可我没有立刻意识到。20年后，我在北京秦城监狱受审时，审讯员说康生、曹铁欧“在渤海区党委时就看出你不对头了”，我才明白过来。

1949年，康生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10月间他病休去青岛。不久，他到北京治病路经济南。我当时在济南市公安局工作，特意去看望他。康生问我：“你对沙韬了解不了解？他在政治上怎么样？在社会部的表现怎样？”沙韬是一年多前应康生的要求从中央社会部调来给他当秘书的。康生这一问来得很突然。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得很爽利：“沙历史清楚，政治上很单纯，整风审干中做有结论，工作表现也不错。”康生面无表情地说：“那他为什么拆看曹铁欧给我的信呢？”这一问，出乎我的意料，我说：“可能是误拆吧。”他摇头表示不以为然。我又补了一句：“刚做秘书工作，没有经验，年轻不懂事也是可能的。”康生很不满意我的回答，默默地坐在那里不吭气，不再理我，我只好退了出来。后来我才知道，拆信这件事发生在沙韬初到康生那里工作的时候，康生在益都闵家庄中共华东局，曹铁欧在沂水中共鲁中南区党委，秘书每天收到的信件不是一封两封，又不认识曹铁欧的笔迹，完全是误拆，而且及时向康生作了检讨，说清楚了，按常理，何疑之有！但是，康生与曹铁欧对此事刻骨铭心，认定是故意偷拆信件，一直不肯放过，并且愈来愈严重，诬陷沙韬是有人指使的“特务行为”，这是后话。

1950年春，康生在青岛休养。曹铁欧时任山东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在济南。一天夜里，曹铁欧来到省公安厅副厅长季明的住处，胡说有人对她“搞阴谋”，她在山东分局“已被严密监视”。季明原是延安中央社会部的干部，曹找季的本意是希望能够得到季的支持，并为她做些什么。季当然不能同意她的说法，一再解释不会有人监视她，并把她送回山东分局的住处。第二

天，季明向主持工作的分局副书记傅秋涛作了报告：傅与分局其他负责同志觉得事出意外，对曹轶欧无中生有，凭空提出“搞阴谋”、“监视”这样严重的指责，极为恼火；但碍于康生的关系，处理上又觉得十分困难。分局的几位负责同志出于好心，认为曹轶欧是心神过于紧张，是病态的反映，考虑送去青岛又恐对康生养病不利，于是希望她去医院或休养所养息一段时间，但遭到曹轶欧的拒绝。不得已，他们希望把她接到我家住几天，缓和一下她的情绪。开始我并不愿意揽这桩烦事，后来分局作出决定并取得曹轶欧本人的同意，我也只好同意了。曹轶欧在我家住了三天，搅扰得我全家不安，傅秋涛等分局负责人才同意我的意见送她去青岛。行前，傅秋涛还同她谈话，说了不少宽解的话。就是这么一回事，引来曹轶欧对我们夫妇的刻骨仇恨。她到北京后曾对罗瑞卿造谣说，在山东济南的一个晚上，我们夫妇两人把她推进一间黑屋子里整她，企图谋害她。罗瑞卿是在1978年把这些话告诉我的。他说从来没有相信过曹轶欧这些鬼话。

1950年春夏间，华东局和党中央电告康生，从健康考虑，劝他离开青岛去杭州休养。康生犹豫再三，先是拟发了一个不同意去杭州的电报，交青岛军管会参谋长陈雷送机要译发，接着又要陈追回，另发一个同意去杭州的复电。这是多年后陈雷告诉我的。康生与曹轶欧去了杭州，心里是不满意的。过了20年后，即1969年，康生在一个材料上批道：饶（漱石）、傅（秋涛）、向（明）都想赶我离开华东，就是指的这回事。傅、向当时都是山东分局副书记。

康生与曹轶欧在青岛、杭州休养期间，一直诬指沙韬在监视他，说连他睡觉时“沙都坐在卧室门外监视着”。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康生常在被窝里抽烟，一次叼着烟睡着了，被子被烧了个洞。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沙韬总要等康生睡着了，检查过烟火才去休息。认真负责的工作，竟被诬为“特务监视”，可恶又可笑！是谁指使派遣沙的呢？康生最早指的是李克农，沙韬是从李任部长的中央社会部调去的。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后，康生又指向饶漱石，饶原是华东局书记。到了1969年，康生在一个材料上又批道“当时我已看出沙是饶（漱石）、傅（秋涛）等人监视我的小走狗，故要沙走”，并且把矛盾进一步指向刘少奇。

康生和曹轶欧在杭州时出了苏枚跳楼事件，杭州住不下去了，1950年7月到了北京，康生住进北京医院疗养。1952年初，我调到北京，在公安部工作，先是李克农对我说：“康生说沙韬有问题，沙有什么问题！”李又说，已经作了安排，“以后不要再让康生见到沙韬就是了”。公安部的一些同志告诉我：康生到北京，罗瑞卿作为公安部长对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负有保卫责任，所以去医院看他，孰料事后康生说，罗瑞卿为什么来看我？对罗抱着疑问和很深的戒备。不少原是延安中央社会部的同志都知道，康生见不得中央社会部的人，也听不得提起中央社会部和公安部。我问过徐冰：“康生究竟怎么了？”徐说：康生到北京，少奇同志见了，说他神情恍恍惚惚，康生要求见毛主席。徐说：“康生是认为中央不信任他。”待到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时候，我才确知，早在1950年康生在杭州、上海时就曾反复向饶漱石说过党对他不信任的话，饶曾报告中央。

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处理了饶漱石的问题后，人们发现6年没有工作、深居不出的康生，又在一些公众场合露面了。这时，他想起我来了，诬说我有“政治问题”，要求中央审查我。由于罗瑞卿和当时在中央工作的一些领导同志的明智，不相信他的诬蔑陷害之词。“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杀气腾腾，信口雌黄，任意诬陷迫害人，我当然在劫难逃了。他伙同谢富治，利用公安部的侦察、情报档案，采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等卑鄙手段，亲笔写下许多批语，诬我为“叛徒”、“特务”，捏造了一个所谓“彭真、罗瑞卿、徐子荣、凌云内奸集团”。我为此坐了7年冤狱。

沙韬当然也在劫难逃。1967年6月，康生从中央调查部“造反联络站”给他的报告中，得知沙韬改名张韬，在甘肃省委组织部任副部长，并看到1954年少奇同志在一个报告上的

批示，大为恼火，怒气冲冲地批了一段话：“我很久不知此人下落，原来改了名字，是反革命分子刘少奇、杨尚昆包庇起来的”，“这是刘、杨、李（克农）包庇之力，他竟然作了副部长”。原来在1954年11月间，沙韬所在组织为了澄清康生对沙的诬陷，曾将有关情况写了报告报送“李克农并尚昆同志”，后又转给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作了批示说：“怀疑沙韬政治上有问题，曹轶欧和我谈过，他们是病时谈的，并且谈到其他的人，但没有谈到饶漱石，我不相信曹轶欧所说的。经过调查，沙韬同志和他的夫人是没有问题的。以上事实应同沙韬同志谈清楚，使他们放心。至于沙韬的工作，也不必因此调动，但也不要为此故意去刺激康生。”这个批示大概就是一度传说的：“少奇同志批示病人之言不可信。”康生怎肯就此甘休！1969年8月，先由曹轶欧写报告给康生，要求组成“沙韬专案审查小组”，“彻底搞清这一阴谋案件”。然后再由康生批示：“同意这种处置”，并诬说这是“涉及刘少奇、饶漱石、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等叛徒集团的反革命阴谋问题”。从此，从误拆一封信起，沙韬受康生、曹轶欧诬陷长达29年，“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关押近8年，受尽了折磨摧残。

罗瑞卿于1978年5月给胡耀邦的信中说：“康也组织了一个所谓专案组整我，罪名两条：（一）包庇凌云，陷害他的贵夫人曹轶欧；（二）包庇沙韬陷害他，这不仅是无中生有，而且是比海外奇谈还要高超得不知多少倍的怪论。这位沙韬同志，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他。”

从1948年至1975年近30年的时间，纵观康生与曹轶欧的种种异常表现，应该有理由相信，他们确是在保护、掩藏什么隐私，怕被人发现或被人抓住。这里，我再引用一段我参加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工作时记录下来的材料：“1975年康生死前曾对人说过大体是这样的一段话：1920……1921……1922……，没有；1923，没有；1924，没有叛变；1925，没有叛变；1926，我没有叛变；1927，没有……接着说，江青是叛徒，她30年代在上海被捕过。”康生吞吞吐吐，欲说又止，他心怀鬼胎，究竟想说些什么呢？！康生到底是什么人？现在还是个谜，但历史总会进一步作出回答的。

□ 《百年潮》2012年11期

~~~~~

【文革一页】

“文革”时期“三突出”文艺创作理论的出笼及危害

· 彭厚文 ·

所谓“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一种极左的文艺创作理论。“文革”时期，由于江青的插手，文艺领域成为“左”倾思想泛滥的重灾区。1966年2月，江青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左”倾文艺理论。这套文艺理论成为“文革”时期开展“文艺革命”的指导思想。后来，随着“革命样板戏”的出笼，这套文艺理论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影响和支配了几乎整个“文革”时期的文艺创作，成为这一特定时期具有标志性的“左”倾文艺理论。

◇ 江青与“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

“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其核心内容就是怎样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它的提出和形成，与江青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1964年，江青就把塑造正面英雄人物作为文艺创作的一个根本任务突出地提了出来。她说：“塑造正面英雄人物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根本命题。”这年7

月，她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京剧应该提倡革命现代戏，而革命现代戏“主要是歌颂正面人物”。1966年2月，她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因此，可以认为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是江青“左”倾文艺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论点。“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就是对这一论点的扩展和发挥。

“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产生的实践背景，则是“革命样板戏”的创作和演出，是对“革命样板戏”创作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而“革命样板戏”则完全是在江青的提倡和扶植下产生出来的。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江青提出在“文艺革命”方面要“有破有立”，“立”就是要标新立异，就是要“要搞出好的样板”。此后，“革命样板戏”的创作和演出，事实上成为“文革”爆发前后“文艺革命”的主要内容。

1967年5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八个“革命样板戏”——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在北京集中会演，宣告了“革命样板戏”的正式诞生。这些“革命样板戏”的诞生，被看作“文革”的辉煌成果，得到了报刊舆论的竭力吹捧，其意义被无限夸大。《红旗》杂志1967年第6期发表了题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认为“革命样板戏”的诞生，是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给无产阶级新文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纪元”；“革命样板戏”不仅是京剧的优秀样板，而且是无产阶级文艺的优秀样板，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个阵地上的“斗批改”的优秀样板。那么，“革命样板戏”的“样板”意义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当时主要是认为它们在社会主义文化史上，第一次在文艺舞台上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第一次在文艺舞台上“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而且还以生动的艺术实践，为无产阶级文艺提供了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创作原则和创作经验”。正因为如此，“革命样板戏”当时不仅被认为是中国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而且被夸大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样板”，“革命样板戏”所开辟的道路，“是全世界革命文艺将要走的道路”。

#### ◇ 于会泳第一次提出“三突出”的理论

“革命样板戏”诞生后，在总结创作经验时，“三突出”被作为一条重要的创作原则提了出来。1968年5月23日，为纪念“革命样板戏”诞生一周年，时任上海文化系统革筹会主任的于会泳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第一次提出“三突出”的理论。他说：“我们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的精神，归纳为‘三个突出’作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重要的即中心人物。”

1969年，《红旗》杂志第11期发表署名“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的文章《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对塑造杨子荣等英雄形象的一些体会》。该文在谈到如何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时，对“三突出”的理论作了更加扼要的表述：“我们的经验是需要注意‘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篇文章后来被1969年11月3日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此后，“三突出”的创作经验向全国推广。

由于“革命样板戏”不仅被定位为京剧的优秀样板，而且被定位为无产阶级文艺的优秀样板，因此，作为“革命样板戏”经验总结的“三突出”理论，自然也就被认为不仅是戏剧创作必须遵循的原则，而且是所有文艺创作都必须遵循的原则。当时有一篇文章就明确提出：“革命样板戏的‘三突出’创作原则，是革命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作为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不仅



戏剧、电影、小说的创作必须遵循这一原则，而且连那些不一定写人物的诗歌、绘画等，也都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1974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尹在勤”的文章《新诗要向革命样板戏学习》，就比较集中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文章写道：“革命样板戏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样板，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和文艺方针的样板。革命样板戏的创作原则和经验，对于一切社会主义文艺都是普遍适用的。”“革命样板戏‘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在文艺创作中的体现，是毛主席倡导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艺术典型问题上的具体运用。这个原则用于诗歌创作，既适用于叙事诗，也适用于抒情诗。”

由于强调在所有文艺创作中都必须遵循和运用“三突出”的理论，因此，“文革”中后期的文艺创作，都带有鲜明的“三突出”的印迹，这一理论也成为“文革”时期具有标志性的文艺理论。

#### ◇ 阶级斗争需要文艺作品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

“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首先提倡的就是文艺作品要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并把它当成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在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上，在社会主义的文艺作品中，提倡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本无可厚非。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可以起到鼓舞人民，教育人民，振奋人民的革命精神的作用；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实际上就是歌颂毛泽东，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中国革命和建设，因此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所以，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应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任务之一。但是，“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主要不是从这一角度来提倡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而是根据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理论，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提倡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认为文艺作品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开展阶级斗争的需要。

在文艺舞台上，在文艺作品中，主要描写什么人物，在阶级社会中，的确会在有意无意中反映出不同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利益需要，或多或少地起到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作用。但这一现象不是绝对的，不是所有的文艺作品都会反映阶级斗争，不是所有的文艺作品都能够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在反映阶级斗争的作品中，大多数的作品在主观上也只是按照作者的价值观，去艺术化地反映人类社会的各种人物和事件，借此表达作者的善恶、美丑、好坏等价值观，而并没有直接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意图。但“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却把文艺作品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绝对化、夸大化，认为在文艺舞台上，以什么样的人物为主要人物，“就标志着什么阶级占领舞台，什么阶级的代表成为舞台的主人”。而什么阶级占领舞台，成为舞台的主人，反映的是哪一个阶级在文艺舞台上实施专政的问题。“在文艺舞台上，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占统治地位呢，还是工农兵占统治地位，这是由哪一个阶级在文艺领域里实行专政的大问题。”这种理论认为，在“文革”前的文艺舞台上，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占了统治地位，“年年月月，世世代代，千百出戏，演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唱的是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帝王将相在文艺舞台上耀武扬威，少爷小姐在文艺舞台上忸怩作态”，因此在这些舞台上都是封建地主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而以工农兵英雄形象占领文艺舞台，“赶跑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就是要在文艺领域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不仅如此，“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还把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与新中国成立后文艺领域所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联系起来。首先是按照《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定调，无中生有地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然后从这一前提出发，认为这条黑线统治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艺舞台，在文

艺舞台上“继续大演特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为早已死亡的封建阶级和被推翻的资产阶级扬幡招魂”，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认为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与这条文艺黑线斗争的焦点，“就是以哪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作为文艺舞台的主人”，这种斗争是阶级斗争在文艺领域的反映，要战胜“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取得文艺领域的阶级斗争的胜利，就必须在文艺作品中大力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从上述观点出发，这种理论认为，随着“革命样板戏”的诞生，李玉和、杨子荣、郭建光、方海珍、严伟才等一大群光彩照人的工农兵英雄人物，“雄赳赳气昂昂地登上了文艺舞台，成为文艺舞台的主人公”，这是“文艺舞台上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既标志着无产阶级在文艺舞台上对资产阶级实行了专政，同时也标志着“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破产”。

#### ◇ 工农兵英雄形象应具备的完美特征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谈到文艺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时，曾说：“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应该说，这是对文艺创作规律的正确概括。但“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歪曲了这一正确观点，提出文艺作品要做到“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就是要塑造高大完美的工农兵英雄典型。这样的工农兵英雄典型，“高就高在具有高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美就美在他们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人”。按照“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这样的英雄典型一般应该具备五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他们都“胸怀朝阳”。所谓“胸怀朝阳”，就是“心中有着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就是他们都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他们的灵魂，是他们智慧和力量的源泉。这些英雄人物之所以能“一片红心为人民”，能够“雄心壮志冲云天”，能够“不屈不挠斗敌顽”，能够化险为夷，能够克敌制胜，就是因为他们“胸怀朝阳”。

二是他们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这种崇高的革命理想，就是“解放全人类，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具有这种崇高的革命理想，是“作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很重要的一个政治素质”，“如果没有这个理想，在舞台上的英雄人物，胸怀就不会宽广，形象就不会高大”。

三是他们都“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人民”。“革命样板戏”里的李玉和、杨子荣、郭建光、方海珍、严伟才、洪常青等英雄人物，“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正是因为“他们怀有一颗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人民的红心”，所以他们才能为革命英勇奋斗，为人民赴汤蹈火。

四是他们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和深厚的阶级感情，和人民群众“同命运，共呼吸，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五是他们个个都是“铁打的金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具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不怕狂风暴雨，不怕千难万险，“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他们就像泰山顶上的青松，“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

上述五个方面的特征，都是从“革命样板戏”里的主要英雄人物身上概括出来的。不论是《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红灯记》中的李玉和、《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还是《奇袭白虎团》中的严伟才、《海港》中的方海珍、《龙江颂》中的江水英，无不具备这些特征。这些特征也就成为了“文革”时期文艺作品塑造英雄人物的一个普遍模式。

文艺作品按照这样的模式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其必然造成的后果就是：第一，文艺作品中只剩下了英雄人物，其他人物都成了陪衬；第二，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千人一面，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是哪行哪业，也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不管是杨子荣、郭建光、严伟才，还是李玉和、吴清华、喜儿，他们都说着同样的话，表达着同样的思想。

为了使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做到高大完美，“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还认为，不能写英雄人物的成长过程，英雄人物一亮相，一出场，就应该是“一尊完美的雕像”；不能写英雄人物的缺点，也不能写英雄人物的复杂性格，否则就是“歪曲、丑化工农兵英雄形象”。这样，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不仅高大完美，而且个个都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上神仙。他们没有任何瑕疵，没有任何缺点，连七情六欲都没有。“革命样板戏”中的主要英雄人物个个都是孤男寡女，在他们的生活中，除了革命事业和革命斗争外，再无其他内容，这就完全脱离和违背了生活的真实。

◇ 文艺作品不仅要描写工农兵英雄人物，而且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所谓“三突出”，核心是要求突出主要英雄人物。1974年5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捍卫革命样板戏的创作原则》对“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有如下论述：“革命样板戏的‘三突出’创作原则的实质，就是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认为，“搞好‘三突出’，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剧中主要英雄人物放在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来塑造。只有这样，才能把英雄人物真正突出出来”。这样，描写阶级斗争，反映阶级斗争，就成了塑造英雄人物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认为，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塑造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展开的。这些矛盾冲突，是实际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的集中反映。在实际生活中，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斗争，但在阶级社会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生活中矛盾斗争的本质和主流。要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典型，就必须围绕阶级斗争这根主线，来组织典型化的矛盾冲突，在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的典型环境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通过对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描写，来反映英雄典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革命英雄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通过对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描写，来反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表现出“最先进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强大力量”，发挥革命文艺的教育作用。

按照这种理论塑造出的英雄人物，都是进行阶级斗争的英雄。似乎离开了阶级斗争，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就不可能产生出社会主义的英雄人物。通过这种英雄人物的塑造，阶级斗争就成为了文艺作品的永恒主题。因此，这种理论完全是为在文艺领域中贯彻执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服务的。

“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要求，文艺作品要以主要英雄人物为中心来展开矛盾冲突，在矛盾冲突中，主要英雄人物应该始终处于支配的地位，是推动矛盾发展和解决矛盾的主导力量。描写和刻画其他人物，都要为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服务。这里所说的其他人物，包括反面人物、正面人物、除主要英雄人物之外的其他英雄人物。这些人物与主要英雄人物的关系是层层陪衬和烘托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所谓的“三陪衬”，即“在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间，反面人物要反衬正面人物；在所有正面人物之中，一般人物要烘托、陪衬英雄人物；在所有英雄人物之中，非主要人物要烘托、陪衬主要英雄人物”。

“三陪衬”实际上是对“三突出”的补充和进一步具体化。它对文艺作品处理其他人物与主要英雄人物关系提出了具体的操作要求。这种要求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处理反面人物形象时，必须从塑造主要英雄人物的需要出发，不能把反面人物写得与正面人物分量对半，或者写得非常嚣张，居于主要地位，否则就会造成“历史颠倒、牛鬼蛇神专政的局面”。当时文艺作品包括“革命样板戏”都是按照这种要求来处理反面人物与主要英雄人物的关系的。例如“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第六场对“杨子荣向座山雕献图”的情节作了这样的处理：“删去了原来的‘开山’‘坐帐’等渲染敌人威风的场面，又把座山雕的座位由舞台正中移至侧边，自始至终作为杨子荣的陪衬；而让杨子荣在雄壮的乐曲声中昂然出场，始终居于舞台中心；再用载歌载舞的形式，让他处处主动，牵着座山雕的鼻子满台转；在献图时，让杨子荣居高临下，而座山雕率众匪整衣拂袖，俯首接图”。这种处理虽然能够突出杨子荣的高大形象，但也完全违背和脱离了生活的真实，所以当时就有所谓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批评这种做法“无视生活规律和舞台法则”。

第二，写一般正面人物要从塑造主要英雄人物出发，烘托主要英雄人物的形象，而不能让一般正面人物夺了主要英雄人物的戏。如果一般正面人物的形象过于突出，或者戏过多，妨碍了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应该怎样处理？“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提供的解决办法：“一是以压低甚至压掉其他人物来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一是在不压低其他人物情节的情况下，使主要英雄人物在其他人物的烘托和陪衬下更加突出。”在这两种办法中，虽然“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强调主要应采取后一种做法，但从当时“革命样板戏”和其他文艺作品的创作实践来看，为了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更多的是采取了前一种做法。如“革命样板戏”《海港》第六场，最初的剧本是由韩小强的母亲对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后来为了突出主要人物方海珍，就删掉了韩母这个人物，改由方海珍对韩小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艳阳天》，在原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老贫农马老四热爱集体，为了养好社里的牲口，自己吃野菜，把粮食省下来喂社里的小牲口。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这个情节被认为“没有按照‘三突出’的创作原则进行再创作，结果没有摆正主要英雄人物和其他英雄人物的关系，不是以马老四烘托肖长春（《艳阳天》中的主要人物），实际上成了肖长春陪衬马老四”。为了突出肖长春，后来把这个情节改成：肖长春自己家里吃野菜，把省下来的半袋小米送到饲养房给马老四喂小牲口。与此同时，“弯弯绕”却跑到肖家门前“闹粮”，影射攻击肖长春，于是激起了马老四的愤怒。他拉着“弯弯绕”到肖家，用事实教育“弯弯绕”。

这种为了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不惜违反艺术真实，让他们据他人之功为已有的做法，大大降低和损害了文艺作品的艺术效果。经过这样的处理，主要英雄人物看上去的确变得高大丰满，但由于这是以其他人物被矮化为前提的，一部文艺作品中，除了主要英雄人物突出外，其他人物变得干瘪而平庸，从而导致他们在反衬和烘托主要英雄人物的实际效果上要大打折扣。在这一点上，“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由于违反了生活的真实和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而暴露出其不能克服的内在矛盾。

“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强调要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来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些艺术手段包括京剧的唱腔、念白、武打或者舞蹈，电影的镜头、光线、构图，等等。“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认为，京剧的唱腔、念白、武打或舞蹈要围绕主要英雄人物来进行设计，特别是要通过唱腔的设计和运用，塑造好主要英雄人物的音乐形象。在唱腔的设计上，首先是要求做到所谓的“三对头”，即感情、性格、时代感对头；其次是要求为主要英雄人物设计成套的、多层次的、完整的唱段，通过这些唱段来表现主要英雄人物的“崇高品质”“远大理想”“博大胸怀”和“坚强意志”。在电影中，镜头、光线的运用，构图的设计，也要为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服务。对主要英雄人物，要多拍近景、正面，光线要明亮，人物要占据画面的中心。对反面人物，则以拍远景、侧背为主，光线要灰暗，人物不能占据画面的中心，而只能处于画面的两侧或者下方。

可以看出，在艺术手段的运用方面，“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也是以削弱包括反面人物在内的其他人物为前提条件，来达到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目的。这样，从表面上看，似乎“英雄人物始终处于压倒阶级敌人的地位”，但由于其他人物被弱化和边缘化，在戏剧舞台上、电影中，往往只剩下了主要英雄人物的表演，文艺作品除了图解阶级斗争外，反映复杂的革命斗争和现实生活的功能却被大大削弱了。

#### ◇ 反思“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

“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不论从其形成过程来看，还是从其内容来看，都是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它竭力提倡文艺作品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让工农兵英雄人物占据文艺舞台，其目的是为了所谓在文艺舞台上，在文艺作品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因此，它完全把文艺作品当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不仅在指导思想上是错误的，而且对文艺作品的功能也作了歪曲的片面的理解。文艺当然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但文艺的功能不仅仅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它还应该有记载和反映社会真实生活，娱乐、教化人民大众的作用。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为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政治路线、方针和政策服务，而不是为宣传贯彻“左”倾的、错误的理论和观点服务。正是在这两点上，“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偏离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正确轨道，它看似非常突出政治，但实际上突出的是“左”倾的理论和政策，而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根本的政治利益。

从历史观来看，“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宣传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的文艺作品，社会主义的舞台，应该反映工农兵，应该歌颂工农兵英雄。但是，“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把反映工农兵，歌颂工农兵英雄，歪曲为任何文艺作品都要层层突出一个理想化的主要英雄人物。这样的英雄人物是完美无缺的，不能描写一点儿缺点，否则就是往英雄人物身上抹黑；这样的英雄人物是至高无上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应该具备的优良品质，在他们身上都具备；这样的英雄人物居高临下，鹤立鸡群，不仅反面人物只能做他们的陪衬，就是其他的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也只能做他们的陪衬。这样的英雄人物完全是概念化的产物，他们已经不仅仅是一般地高于生活，而且同生活完全脱节了，是生活中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人物。因此，塑造这样的英雄人物，实际上是宣传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英雄史观。

从实践后果看，“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对“文革”时期的文艺创作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它给文艺创作规定了一个千篇一律、万古不变的模式，文艺作品的英雄人物都应该高大完美，具备某些共同的政治素质，其他人物与主要英雄人物的关系都应该是层层突出的关系，陪衬与被陪衬的关系，铺垫与被铺垫的关系，而且对主要英雄人物应该具备哪些政治素质，应该怎样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都有详细具体的要求和规定。“文革”时期，“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在文艺领域以强制的方式推行这一理论，不仅把它规定为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而且把坚持还是反对这一理论，提升到“文艺战线上前进和后退的斗争”“反复辟和复辟的斗争”的阶级斗争的高度来强调，从而使文艺工作者被约束于“三突出”的框框内而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就造成了文艺创作题材的单一化、情节的雷同化和人物的脸谱化，大大压缩了文艺创作的空间，损害了文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娱乐作用。这一时期，电影、戏剧、小说、诗歌等文艺作品的数量急剧减少，“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而在少得可怜的文艺作品中，艺术水平也大为下降。应该说，这种状况的出现，与“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是有着直接因果关系的。

□ 《党史博览》2012年11期

~~~~~

【往事非烟】

## “九一三事件”中的空军夜航师

### • 一直在飞 •

父亲的空军生涯写了有将近30篇了，有心人应该早就可以查出父亲的姓名，职务。应该不会有人怀疑当年的中国空军中是否有这么一个一直在飞的歼击机飞行员。应该不会有人再质疑我写的一切是否属实了。但还是一直不敢写父亲的913之夜，我还是有顾虑。直到一个网友的来信震动了我，他说：“我们有义务记下历史，给后代留下一些真实的东西。”于是，我写了，如实记下父亲那晚的经历，任凭大家去核实、考证。

文中涉及的一些人物，我都用真实的姓，名字除公开文献上有的，其他的目前我不会公开，但我可以负责的说，他们目前绝大多数都健在，如有需要，他们均可以证明本文的真实性。

下面就开始吧！

1971年8月初到9月6日，父亲在北戴河西山空军疗养院疗养，期间经历了两件事。

一次晚餐时，空勤灶的工作人员给每个飞行员发了薄薄的一片哈密瓜。这可很不正常，平时发水果，有点像现在的自助餐，基本上是随便吃，这一片哈密瓜使有的人嘀咕起来。

正在这时，有个负责的军官大声宣布：“林副主席现在也在北戴河，他非常关心大家，这是林副主席送给大家的哈密瓜。”

听到这个消息，全体人员起立鼓掌，有的人就把这片哈密瓜留起来不吃了，说是要带回家去，作为永远的纪念。

又一天，父亲和五、六个一起疗养的飞行员出去散步，不知不觉来到离疗养院两公里左右的北戴河的河边（咸水河）。看到一群人在岸边正从水中向岸上拉一辆经过改装的北京吉普。父亲他们停下来，父亲认出那些人里有林立果。

当时空军各部队都在搞一些技术创新，主要研究一些如何利用现有设备的改造来更有效地打苏修。父亲也当过一、两年“团科技小组”组长，对这种试验并不陌生。

这时有人轻轻说：“看来水陆两用车的研制工作不太成功，怎么一下水就沉了？”

大家对这件事也不太关心，看了一会就离开了。

9月6日，父亲疗养结束，返回部队。

9月10日，上级通知父亲，从9月11日起，作为现场指挥员，在机场负责战备值班一周（父亲负责白班，夜间战斗值班由独立大队负责）。

9月12日晚，父亲在机场的值班宿舍休息。

半夜，值班的调度员刘X军来了，叫醒父亲，说：“有一架三叉戟飞机要到我们机场落地，上级要你指挥。”（由于是被突然叫醒，所以父亲回忆不起具体时间，根据查找现在的文献，应

该是12：00之后）

父亲出了值班宿舍，说：“我是白天的值班指挥员，夜航飞机落地不应该找我，应该找独立大队。”

刘：“上面让我就找你一个人，这架飞机执行的任务是空军首长亲自指挥的，是梁参谋长亲自指挥的！”

听了这话，父亲没话说了，两人一起向指挥塔台走去。父亲心里觉得不太对劲，他还是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空军指挥所越过北空指挥所—军指挥所—师指挥所，直接调动他这个机场战备值班指挥员。

正常情况下，空军领导下达一个指令，要经过空军指挥所—北空指挥所—军指挥所—师指挥所—机场战备值班室。

师指挥所指挥员与机场指挥员的关系是：师指挥所把握原则，下达指令，监督任务完成情况，并不负责具体的指挥工作。机场指挥员负责具体操作，进行现场指挥。例如：上级命令进入一等战备。师指挥所负责通知机场指挥员并监督执行情况；机场指挥员负责召集所有相关人员做好战斗准备，安排布置任务，进行现场指挥。

各级指挥所具有战斗值班作用的同时，也保证要有一个高级军事干部24小时在指挥所内值班。具体到师一级指挥所，如果一线领导牺牲，指挥所值班的师领导可以接替指挥。保证指挥系统的通畅。所以各级指挥所都设在隐密地点，建筑设施坚固异常，可以防空袭，甚至防核。

父亲又说：“我十几年没有飞过夜航了（从1959年福建轮战后就沒飞过，夜航独立大队1960年成立）也没有指挥过夜航飞行，很不熟悉，怎么办？”

刘回答：“有什么问题，咱们研究研究……”

父亲是他所在航空师的两个专机指挥员之一，曾经指挥过周总理、林彪等许多要人的专机，有专机指挥经验。

所以父亲问：“夜航指挥（信号）灯怎么用？飞机落地后是否加油？都加什么油（飞机除燃料油外，还有滑油等）？三叉戟是专机，飞机上有什么人？落地后准备饭吗？加油后是走还是住下来？用什么规格接待？”

刘：“咱俩研究一下怎么用夜航灯的问题。上面通知这架飞机是执行任务的，其他的什么都没说；飞机上有什么人和接待规格也没提；只说是（这架飞机）完成任务后回来落地，住不住吃不吃都不知道。”

父亲：“这些情况，你要了解清楚

俩人正说着话，塔台到了。

进了指挥室，父亲犯了难，平时指挥飞机，身边有助手：领航员和标图员位于指挥员两侧，负责随时注意各飞机的位置，不时向指挥员提供最新情况，此外指挥塔台里还有负责机械、作战、训练、通信、场站等十名各专业的参谋，随时监视飞行状况。机场夜航时还要有各种保障

车辆到场，如救护车、消防车、牵引车、加油车、着陆探照灯车，电源车、冷气车、氧气车、及相关医护、消防、地勤机组人员等。而今晚的这次指挥，只有指挥员和调度员两个人，连个标图员都没有！

也没有地勤机组人员，实在是太反常了。

不管怎么样，要先将飞机降落所需的各项条件准备好。

父亲先让刘X军通知雷达和无线电开机。

之后，父亲就开始试验夜航指挥信号灯，想通知远处的负责控制跑道灯的战士打开灯光。

那个年代，塔台是通过塔台上不同颜色的信号灯与跑道灯管理员联络的。

父亲试了几次，分别开关几盏不同颜色的信号灯，跑道灯管理员明白了父亲的指令，打开了跑道灯。

此时雷达与无线电均已开机，雷达值班员也已看到飞机，不断向塔台指挥室报来飞机的坐标方位。但由于塔台内既没有标图员，也没有地图。无法知道飞机准确的位置。父亲和刘X军只能根据经验，通过报来的雷达坐标，对照脑中的地图，记下飞机的大致方位。有点像下盲棋。父亲此时没有向空中的飞机喊话，也不知道飞机编号。所以只是随时关注着飞机的飞行航向，等待其执行完任务后与机场塔台主动联络。

不管怎么困难，此时机场已具备飞机降落的基本条件了，父亲有了指挥飞机落地的把握。

雷达员又报来飞机的新坐标方位，父亲对照了脑海中的“地图”，一下子警惕起来：飞机已飞过机场，到了离机场250公里处的化德一带，这是飞行控制线。任何飞机在飞行时都不可超出这条控制线。出去了就算叛逃，可以派战斗机去追。

于是父亲请示空军：“这架飞机到了飞行控制线了，我们怎么办？”

空军答复：“你们不要管！这架飞机是去执行任务的。”

父亲感到可疑，问刘X军：“这种情况，过去有没有过？”

刘答：“有过，有两种情况：

一是去侦察中苏、中蒙边境，飞机是去执行侦察任务的，出发时谁也不通知，由空军直接指挥。刚才不是通知我们这架飞机是梁参谋长亲自指挥的吗？所以可能是这种情况。空军会在飞机完成任务后直接通知某一个机场，指挥该飞机落地。

二是我们国家已经有原子弹了，如果有新的原子弹爆破，飞机可能是去采集空中样本。这种情况也是由空军直接指挥，完成任务后才通知某机场引导飞机降落。”

听了刘的介绍，父亲相信了，觉得这架飞机可能是去执行任务，由于自己没有执行过夜航指挥任务，少见多怪了。于是埋头算起飞机的油量来（按该飞机在北京加满油后，先飞到山海关机场再起飞完成此任务的航线来估算），担心飞机飞回来时不够油。



过了一会，刘告诉父亲，飞机现在在中蒙边境二连浩特附近盘旋。父亲觉得，既然飞机是在执行侦察任务，盘旋一下也正常。

过了一会，刘说：“飞机飞出去（中蒙边境）了！”

父亲问空军：“飞机为什么飞出去（中蒙边境）了？！”

空军答复：“唉！这架飞机不应该飞出去的！但是它出去了！唉！”

父亲：“那我们怎么办？”

空军：“回去睡觉！”

由于父亲一直在计算飞机的油量，按在北京加满油计算，飞机在二连浩特盘旋时，应该还剩两吨半油。

这次夜航指挥任务，由于是空军越过北空一军一师直接调动的父亲。所以直到现在，知道这件事具体经过的人仍然很少。北空、军、师的领导均不知情。应该只有空军指挥所的人员、父亲、调度员刘X军知情。其他的诸如雷达值班员、跑道灯控制人员和无线电值班员均不在指挥塔台内，他们只是在完成各项指令，不可能知道详细情况，但他们应该记得接到的开机开灯命令。

这段经历，父亲一直守口如瓶，虽然没有任何人要求过他保密。

回到值班宿舍，父亲睡不着觉，点燃一根烟，抽了起来。

这么一折腾，另外四名团里的战备值班飞行员（王X德等）也醒了，问父亲怎么了？

父亲说：“有架三叉戟跑了，你们分析一下是谁跑了？”

大家这个一句，那个一句分析起来。

都觉得有可能是刘、邓、彭、叶中的某个人。

大伙正讨论着，父亲手里的烟还没有抽完。一等警报铃响了。师战斗指挥所的电话来了，通知父亲：立即进入一等战备，有一架直升机，里面有五个特务，他们是反动的，是敌人。要求坚决把这架直升机打下来。又补充说：但是这架飞机是我们的，机身上有红五星标记，不要发生误会（不要以为飞机是我们的就不打了）。

这个一等战备的命令是按正常途径经空军—北空—一军—一师一级级传达下来的。命令同时也传达到相关各部门和夜航独立大队。整个机场顿时沸腾起来。

父亲立刻向指挥塔台跑去，飞行员们则迅速向飞机方向跑去，到了塔台，相关人员陆续赶到，父亲指挥他们又一次打开跑道灯，雷达，无线电等设备。

一切工作准备完毕。父亲命令独立大队飞行员郑X道（其子郑X宇是我小学同班同学）起飞拦截敌机。

这时塔台内的工作人员已全部就位。师长和一套作战班子随后也在一等警报铃响后半小时左右赶到了机场。

师长在塔台下大叫着父亲的名字说：“一直在飞，上飞机起飞！”

父亲说：“师长，我有十几年没飞夜航了，夜航技术很生疏，硬让我起飞我也可以飞，但我实在没有把握。”

师长沉吟了一下，说：“那叫独立大队的邓X道（其子邓X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起飞！”

这时，机场内共有歼五战斗机7架，其中属于独立大队的是2架歼五甲（父亲说是俄文发音：泼一F飞机，此时均已起飞），还有属于父亲团的5架歼五。

独立大队在进入一等战备后，也将其所属的其余飞机拉到了现场。

由于是实战，父亲考虑飞机数量可能不够，没有请示上级，擅自决定从洞库中拉出属于本团的战斗机8架。指令下达后，地勤人员从洞库中拉出8架歼五待命。

执行截击任务的战斗机则始终保持着空中有一架战机在地面引导下搜索敌机，一架飞机在返航途中，一架飞机在地面准备起飞的状态。

父亲一边指挥战斗机向雷达通报的直升机靠近，一边向直升机驾驶员喊话（上级已通报驾驶员飞行编号，事后得知这个编号不是陈修文的，而是另一个飞行员陈士印的。陈修文休假刚归队，被临时拉来当驾驶员，所以此时机内有两个驾驶员），叫他回来。但直升机一直没有答复，但父亲发现该机驾驶员会有时打开无线电开关（是个按钮，在油门上），可以听见机内的一点声音，但没有听到交谈声。

向直升机的喊话一直没有停止，执行任务的战斗机也一直在寻找着目标，但均未寻获。那时歼五甲飞机的雷达有效搜索距离只有几公里，而且只能搜索机头雷达正前方一定角度范围内的目标，在夜间执行任务时起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且，直升机的飞行速度远远低于歼五的飞行速度，加之又是夜间，所以搜索起来难度很大。

这时地面雷达报告，说失去目标，看不见直升机了，接着无线电也与直升机失去联系。

考虑到直升机失踪时已接近中蒙边境以及它的航向，父亲想：完了！又跑了一架！雷达看不见，无线电失去联络。战斗机起不起飞都无所谓了！

正想着，突然在机场上空听到直升机的轰鸣声，父亲赶紧向正在空中搜索的战斗机喊话，说：“敌机就在机场上空，立刻到机场上空来拦截！”脱口而出的另一句话给父亲带来了个不大不小的麻烦：“飞机上有好人！”指挥塔台内的很多人都听到了这句话。

独立大队的飞行员报告说发现敌机，在前方闪了一下。

父亲下令：“坚决把它打下来！”

战斗机飞行员：“又看不见了。”

这是执行此次一等战备任务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战斗机飞行员发现直升机。

直升机在飞越机场之前，飞经空军家属院（距机场约20分钟车程），把我惊醒，哇哇大哭，母亲一边哄我，一边奇怪：怎么这么晚了，还进行夜航飞行训练？奶奶也在一旁帮忙，她们都听到了直升机的轰鸣声，感觉飞的很低，好象就在我们家的楼顶上空。

从地面雷达报告失去直升机踪迹，到陈修文驾驶飞机在怀柔降落，该飞机始终处于雷达的盲区，一直没有被发现。

父亲根据直升机声音消失的方向，分析出其航向，是向北京方向飞。

于是命令空中正在搜索的飞机，向北京方向追击，搜索北京空域以北地区，要求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搜索，防止敌机在北京进行破坏活动。但依然没有找到直升机。

天已蒙蒙亮，轮到父亲团里的飞行员王X德起飞执行任务。这时传来消息，说：直升机已降落。于是父亲命令王X德返航，搜索行动结束。

这时参谋向父亲通报：上级通知从现在开始，任何飞机都不许起飞，飞行员、地勤人员不得接近飞机。

就这样，9月13之夜，父亲共指挥了13架次战斗机起飞拦截直升机。

王X德落地后，父亲发现陆军部队已接管了机场，在指挥塔台、跑道两头布置了岗哨，其中跑道两头架设了高炮。并再次重申：飞行员不许接近飞机，地勤人员不许对飞机进行常规保养检查。

军、师指挥所也被陆军接管。

军指挥所去了一个连的陆军。

军副参谋长张X兰早上走出军指挥所（昨晚应该不在战备值班室），发现岗哨全换成陆军士兵，很是疑惑，问发生了什么事？

参谋说：“我们被接管了。”

张大怒，说不像话！为什么不报告我？！要去找人理论

参谋赶紧拉住了他，说千万别说话。

张才似乎明白了什么，不出声了。

9月13日之后不久，父亲已知道三叉戟上的“要人”是林彪。

事情过去一两天后，一些消息走漏了出来，父亲得知后，给上级写了一份材料，反映9月12——9月13之夜父亲认为反常的现象。内容有二：

一、质疑上级传达总理指示有误。

事后开会领导说总理对直升机的指令是：坚决把它拦截回来。但父亲当时听到的指令是坚

决将直升机击落，打下来。

二、明明有夜航独立大队的飞行员，为什么却命令父亲起飞？

接着，上级就“飞机（直升机）上有好人”言论开始了对父亲的审查。

军、师两级均派人来调查父亲。

他们的主要观点如下：

师调查组的人说：直升机里都是坏人，没有好人。

军调查组的人说：上面通报，直升机内全是坏人。

军、师一致认定：父亲的言论有问题。

军调查组个别知道内情的人还说：也太巧了！你在北戴河疗养，林彪也在北戴河。林彪跑了，又刚好安排你战备值班，还指定要你指挥！真是太巧了吧？

对于这些问题，父亲回答：

我认为我的言论没有问题，那只是个人分析。雷达最后一次发现直升机，是距外蒙边境 70 公里处。之后雷达看不见（直升机），无线电联络不上。在这种情况下它还飞回来，飞机里应该是有好人。

如果我有问题，事后我为什么还写材料反映当时不正常的情况？

如果我有问题，当时怎么会从洞库中调出 8 架飞机待命？！

我是师里的两个专机指挥员之一，在那种情况下，这架飞机（林彪座机），应该由我指挥（上次林彪来视察，其座机就是父亲指挥的）！这很正常。

至于去北戴河疗养，是上级安排的，我本人并不知道原因。

父亲被审查了一个星期左右，江青发表了个公开讲话，大意是：直升机上有好人，陈修文是革命烈士。

这个讲话使父亲解脱了，审查不了了之。

以上是父亲亲身经历的 9 1 3 事件。欢迎朋友们理性探讨、指正。不欢迎怀疑一切的质疑。

几个当事人的下落：父亲——离休在京

师长——离休在京

刘 X 军——当时 20 多岁，现在何处不详

邓 X 道——不详

郑 X 道——转业到河南

王 X 德——转业到河北

~~~~~  
【史海钩沉】

1975年邓小平曾组织“写作班子”抗衡江青

• 丁 东 •

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受命主持中央工作，而此时，“文革”尚未结束，“四人帮”还在台上。为了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相抗衡，邓小平组织了一个“秀才班子”……

◇ “文革”中发迹的写作组

20世纪70年代，写作组在中国大陆曾经领导舆论。影响最大的，是以“梁效”为主要笔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和曾用“罗思鼎”等笔名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其次，还有以“初澜”为笔名的文化部写作组、以“唐晓文”为笔名的中央党校写作组、以“洪广思”为笔名的北京市委写作组等。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几乎每期都有这些写作组的文章。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成立于1973年，次年，中共中央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发出了该组整理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由此启动了席卷全国的批林批孔运动。该组也就成为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机构。据当事人范达人回忆：这一组织最初定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后来用了许多笔名，如梁效、柏青、高路、景华等，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笔名是“梁效”。为什么取“梁效”呢？记得在此之前的年初，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林彪、孔孟之道的文章，大部分都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名义。当时，姚文元提出，能不能用笔名？他说，如果报刊上经常出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署名文章，有点不大好。在一次会上，迟群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当时建议用“梁效”，因为一则北大、清华是两所学校，“梁效”与两校谐音，再则用“梁效”两字从语音听亦不错，表示良好效果的意思。

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前身叫“红旗杂志上海组稿小组”，成立于1968年9月，由张春桥、姚文元指定徐景贤领头，实际上由朱永嘉负责。直到1971年五六月间，由上海市委写了正式报告，7月，经张春桥、姚文元批准，过渡为上海市委写作组。

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笔名除丁学雷、罗思鼎，还有康立、石一歌等。据记载，上海市委写作组从1971年7月正式建立，到1976年10月停止活动，共发表文章800篇左右。

◇ 邓小平组织“秀才班子”抗衡江青

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最早、国际影响最大的写作班子，是成立于1963年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也就是邓小平说的“钓鱼台的班子”。

1975年，邓小平一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也组织了一个秀才班子，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抗衡，这就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据当事人于光远回忆：这年（1975年）1月6日，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考虑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李鑫等人当国务院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他还出了一些题目，如三个世界的划分、苏联的社会性质、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

世界经济危机问题，也说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

邓小平说，写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胡乔木说，听说写作班子比较有成绩的，大概数北大清华大批判组、上海市委写作组、北京市委写作组，是否从他们中间调一些人？邓小平听了，先是沉默不语，接着转换了话题。

由此可见，邓小平组织这个写作班子时，想到的模本是“九评”的写作班子，成立的公开理由是毛泽东认可的反修反帝。但胡乔木最初并不理解邓小平的真实意图。

政治研究室的领导共有7位：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邓力群、李鑫。不过经常见到的只是胡乔木、于光远和邓力群几位，李鑫根本没见过，只知道是康生的秘书。

邓小平将写作班子命名为政治研究室，表明他倾向于机构的正规化，和张春桥、姚文元不赞成机构正规化的态度正好相反。

#### ◇ 写作组成员的结局

1976年10月以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和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都作为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加以审查。北京大学在首都体育场，于1977年12月29日召开了万人批判大会，范达人还一度入狱。在1983年开始的整党中，“梁效”成员受到如下处分：

第一，李家宽、宋伯年、王世敏属“三种人”（注：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开除党籍；第二，范达人、钟哲民犯有严重错误，给予党内警告处分；第三，叶朗、杨克明犯一般错误，记录在案；第四，汤一介、胡经之等组长一级成员犯一般性错误；第五，一般成员不予追究。

后来，一些曾经是“梁效”成员的学者，在北京大学还是获得了重新发展的空间，有的成为著名的学术带头人，有的担任了系主任乃至副校长等领导职务。在上海，徐景贤被判处徒刑15年，朱永嘉被判处徒刑14年，王知常被判处徒刑12年。写作组的其他成员也受到不同的处理，总的来说，受到的处分较“梁效”严重。

一种看法认为，写作组成员的教训是跟错了人。如果他们跟的人在政治上不倒台，他们也不会倒霉。按照这种逻辑，似乎跟对了人就可以避免悲剧。其实，写作组的悲剧不过是中国知识分子大悲剧的一部分。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跟对人，而在于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丧失自身的独立性。

□ 摘自《东楚晚报》2010年8月22日

~~~~~

【各抒己见】

我们该如何反思文革？

• 孙立平 •

1、文革是历史留给中国的巨大历史遗产，中国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与如何反思这个遗产有关系。近日由于网络反腐的问题，有人又提起文革的大民主问题，认为网络反腐有文革式大民主之嫌。这个问题很需要澄清。但因为这个问题太复杂，我这里仅仅根据上个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反思文革的过程及其产生的不同结果，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2、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否定和反思文革开始的。但当时的反思是经历了一个转折的，正是因为这个转折使得中国走向了今天。

3、反思是从“伤痕文学式”的讲述开始的。本来，在一场灾难之后诉说苦难，是反思的自然起点。但这种以诉苦为载体的反思，有一个注定的弱点，这就是，尽管可以说文革的受害者实际上是分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但一般地说，上层人物的苦难（主要是作为开国功勋的老一代革命家、老干部和著名知识分子、文化人）更具有讲述性，而普通人的苦难则不太具有讲述性（其实，论苦难的绝对程度，应当是地富反坏右这些所谓的黑五类）。更重要的，当时的现实背景是：文革已经结束，华国锋等文革温和派在执政（后被称为凡是派），许多老干部还没有平反。在这种情况下，对文革苦难的诉说，与平反冤假错案和老干部出来掌权的要求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对文革苦难的诉说，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上层人物苦难的诉说。而且，在这当中，已经隐隐约约潜含着一种的要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找一下当时“三子”即票子房子和儿子的说法，也可以查找一下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

4、但尽管是如此，这样的反思仍不可避免地开始向文革背后深层的体制原因方向延伸。有两个因素也许对这种延伸起到了作用。一是数以千万计的陆续回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们中许多人既有与现实接触的感悟，又有逆境中的阅读与思考。二是恢复高考后在高校积聚起来的以百万计的77、78、79大学生，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同时又有在理论上较深入地思考。这样，对文革的反思，就逐渐接近“专制与极权”的体制问题，他们反思的不仅是文革，也包括文革前的17年。这也是思想解放与启蒙运动的先声。由于两个原因，这种最初的反思被默认了。一个因素是，当时执政的文革温和派比较软弱，已经自身难保。另一个因素是，相当一部分老干部还没完全掌握权力，也需要借助这种势获得绝对优势。于是当时的气氛就是，人们畅所欲言，改革开放启动。

5、在所谓凡是派下台，老人控制了权力之后，对文革的反思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文革被视为对文革前17年正确路线的偏离，并开始将文革视为“大民主”。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79年11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取缔“西单民主墙”。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禁止在西单墙张贴大字报。1980年4月8日，由邓小平提议，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同意中共中央建议，取消《宪法》第四十五条中“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力”的条文。

6、这个反思的转折点很重要。只要经济体制改革，不要政治体制改革，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个基本原则，官倒，弱势群体成为改革的受害者，权贵体制的形成，稳定压倒一切，都是由这里出发的。

7、我觉得，在今天，仍然存在对文革的两种反思。尽管在感情上有人会觉得很难接受，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对文革的反思来自两个力量，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思。一种是主张改革的往前走的进步力量的反思，强调的仍然是文革的极权特征。另一种是想维持现状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指文革是大民主，暴民政治。一个看起来很有道理但却很容易引起歧义的说法是：毛泽东是利用大民主搞个人独裁。而在现实中，一些反思也很容易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我们现在经常可以看到下面这样的说法。你一说现在腐败，他就说文革的时候更腐败。什么意思？反思文革成了对现在腐败的辩护？你一说现在贫富差距大，他就说，文革时候贫富差距更大。什么意思？反思文革成了对现在贫富差距的辩护？所以，如何反思文革，是个大问题。

□ 摘自作者博客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 //www. cnd. org /](http://www.cnd.org/)

---